

“批判”话语的谱系学研究

姚文放

(刊于《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创刊号)

内容提要 “批判”话语从康德的哲学界定开始，继而黑格尔将其提升到辩证思维的高度，随之马克思对其进行科学的改造并将其引向社会历史场域，接着法兰克福学派在特定语境下将批判精神引向对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激烈抨击，当今中国学界质疑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过激批评，谋求大众文化批判的话语重建。200余年来的嬗变递进，构成了“批判”话语的谱系学框架。本文通过“批判”话语的谱系学研究，寻绎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对于“批判”话语的形成和演变所起的规定和形塑作用，并揭示了当今中国的“批判”话语更具建设性、构成性的充足理由律。

关键词 “批判”话语 谱系学 社会历史语境 权力关系 规定 形塑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批准号：11AZW001)；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话语的“谱系学”研究其旨并不在研究作为一般语言学、符号学意义上的话语本身，而在寻绎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对于话语的形成、演变所起的规定和制约作用，因此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模式具有较高的物质性、实践性品格，能够较为深入地穿透实际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现象。“批判”这一当今文学理论的热门话语，从康德的“批判”到黑格尔的“批判”，再到马克思的“批判”，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再到当今中国学界的“批判”，构成了“批判”话语的谱系学框架。它的内涵是在川流不息的时间过程中不断迭加、增殖起来的，它穿越了两百多年，旅行了众多国家，经过了多个语种的翻译和多种文化的传递，它就像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可以见出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予以关注的，应是“批判”话语在时光隧道中穿行的轨迹，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对它的规定和形塑。

一、康德：“批判哲学”作为“学理的探究”

“批判”概念源自希腊文，在欧洲有着漫长的发展史，但它最早作为哲学话

语得到确立是康德的功劳。康德的“批判哲学”就以之命名，并在其“三大批判”特别是“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及其简写本《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对于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厘定和论证，奠定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论的崇高地位。

康德作出这一历史性贡献是有具体背景的，那就是对于长期以来占据一切科学之王座的形而上学或曰哲学的除旧布新。康德构筑“批判哲学”的主要动因在于大陆理性派与英国经验派两大山头的争锋，前者以先验理性为世界本体，后者则以后天经验为世界本体，由于缺少统一的标准，失去检验知识的真理性的试金石，二者陷于各执一端的纷争之中，使得形而上学变成了无休止争吵的战场。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为中坚的理性派操持的独断论将形而上学的立法变成了一种专制统治，而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派则力图以怀疑论来摧毁理性派的堡垒，但其固执己见和偏守一隅恰恰使自己也坠入了独断论的泥潭。从而这场形而上学的内战开了一个天大的历史玩笑，两派之间针锋相对的纷争恰恰以殊途同归的结局而告终，导致了形而上学之中独断论的盛行一时。

康德的“批判哲学”始终贯穿一个强烈的主旨：必须打破独断论主宰形而上学的局面，而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理性的“法庭”。康德指出：“这个法庭能够受理理性的合法性保障的请求，相反，对于一切无根据的非分要求，不是通过强制命令，而是能按照理性的永恒不变的法则来处理，而这个法庭不是别的，正是纯粹理性的批判。”¹康德郑重宣告：“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²这里高调推出的“批判”概念是二义的，康德不仅藉此来破除旧的形而上学，而且也试图藉此来建立一种新的、未来的形而上学。他说：“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整个方案，以至一切办法。别的途径和办法是不行的。”³

康德进而指出，所谓“批判”，只是一种方法论的工具，并不是形而上学本身，不过它的意义和作用却非同小可，它搭建了未来形而上学体系的整体架构，为之打下了基础，明确了定位，理清了途径，划定了范围：“这项批判是一本关于方法的书，而不是一个科学体系本身；但尽管如此，它既在这门科学的界限上、也在其整个内在结构方面描画了它的整体轮廓。”⁴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方法论的“批判”更具涵盖力，它与未来形而上学体系是一种总分关系：“批判和普通的学院形而上学的关系就同化学和炼金术的关系，或者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关系一样。”在康德看来，如果谁要对于“批判”的原则加以深思熟虑，那就会对于形

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版序，第3页。

²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版序，第3页注①。

³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0—161页。

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版序，第18页。

而上学的弃旧图新产生强烈的愿望：“谁尝到了‘批判’的甜头，谁就会永远讨厌一切独断论的空话”，“他还将以某种喜悦的心怀期望一种形而上学”。¹

尽管康德倡言“批判”旨在谋求形而上学的弃旧图新，但它并非指向特定的某本书、某个理论体系，而是指向一般的理性能力以及它所追求的一切知识，而这与所有书、所有理论体系可能都有关系。因此康德的“批判”其实是仰望着更高的目标，超越于所有的具体事项之上，而这乃是执行最高“原则”的律令。他这样说：“但我所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对这些书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纯粹理性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一切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²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康德的论述中，始终像幽灵似的飘忽着一个最高的、永恒不变的原则或法则，那就是他悬为终极力量的超验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与他信奉的“灵魂不死”、“上帝存在”之类信条相通，从而为世人所诟病。

关于康德厘定的“批判”概念的上述外延，杨祖陶先生在“中译本序”中分析得较为详切：“《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贯彻始终的根本指导思想或一条主线就是：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³质言之，康德的“三大批判”旨在辨析人的心理功能，考察人的理智、意志、情感有多大能力、多大范围，思考获取知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成为可能等问题，可见康德所说的“批判”只是一种学理性的考察、辨析、厘定、研究，并无排斥、反对、责难、抨击的意味，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它是一种“一般研究”、一种“学理的探究”。⁴新近读到对于瑞士学者埃米尔·瓦尔特—布什⁵的一次访谈录，布什对于德文中的“批判”(Kritik)一词作了比较清晰的辨析和厘定，他的意见是，Kritik“这个词源自希腊文，意思是评说评论的艺术；它是个中性词，意为对事物进行区别、分析、评判。它可以是批评，也可以是建议。康德的三大 Kritik，就是将纯粹理性、判断力、实用理性作为建议提出来倡导的。”⁶可以认为，布什这一意见是符合康德的“批判”概念作为一种“一般研

¹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1页。译文按原意有所改动。

²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版序，第3—4页。按译文根据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上)，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的更改而有所改动。

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祖陶：中译本序，第2页。

⁴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⁵埃米尔·瓦尔特-布什(1942—)，社会学家。曾先后在苏黎世、图宾根、柏林和法兰克福大学学习社会学、哲学和历史，1969年在阿多诺和哈贝马斯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自1977年起在多所瑞士大学任教。他的著作《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2014年在中国出版。

⁶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郭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究”、一种“学理的探究”的本义的。

二、黑格尔：“反思性批判”与“否定的辩证法”

康德对于黑格尔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黑格尔对于康德的质疑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康德批判哲学的质疑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研究的起点，这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研究中尤见明显，其《逻辑学》《小逻辑》的总论部分对于哲学要义和逻辑学概念等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于康德批判哲学的批评之上的，后面才引出主干部分关于“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的讨论。也正是通过这种批评，黑格尔将康德的“批判”概念向前推进了。

黑格尔首先在思维方式上考量“批判”概念，认为“批判”必须达到“反思”的水准，否则它不能到达哲学理念的本真事实。他说：“哲学的事实已经是一种现成的知识，而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首先，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通意义的反思。但那无批判的知性证实它自身既不忠实于对特定的已说出的理念的赤裸裸的认识，而且它对于它所包含的固定的前提也缺乏怀疑能力，所以它更不能重述哲学理念的单纯事实。”¹可知黑格尔提倡的是一种“反思性批判”。所谓“反思”（德文 *Nachdenken*，英文 *Reflection*），即对于思想的思想、思想之后的思想，这是一种反躬自省的思想、一种回溯以往的思想，有似中国人所说“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思想，所以它是一种自觉的思想、可以达到真理的思想。在黑格尔看来，“批判”必须达到这样的思维水平才是合格的。与之相对立的是缺少反思的知性思维，它既不能达到对于理念的把握，又不具对于把握理念的固有前提的省察能力，所以它不能真正认识理念本身。

在黑格尔看来，用“反思”的水准来衡量，康德的“批判”概念是有缺陷的。如前所述，康德所说的“批判”旨在考察人的理智、意志、情感三大心理功能有多大能力、多大范围，能否获取知识以及如何获取知识等问题，而且康德还强调“批判”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的重要性，认为人们在进行工作之前，必须首先认识用来工作的工具，假如工具不完善，则一切工作都将归于徒劳。尽管康德的这些思想获得了不少赞同和褒扬，但这并不能改变其缺少反思的知性思维特点，因而在考察认识活动与考察作为认识之前提的方法论工具两方面都存在欠缺。黑格尔指出：“要想执行考察认识的工作，却只有在认识的活动过程中才可进行。考察所谓认识的工具，与对认识加以认识，乃是一回事。但是想要认识于人们进行认识之前，其可笑实无异于某学究的聪明办法，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

版，译者序，第3页。

¹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页。

下水。”¹黑格尔这一比喻的说法很有趣，难怪他在著作中多次使用，就是说，将掌握游泳的方法与下水游泳割裂开来是永远不可能学会游泳的，人只能在游泳过程中才能掌握游泳的方法。同理，认识思维方法不能在思维活动之前，而只能在思维活动之中，如果将两者切割开来则不可能对于思维方法有效地加以认识。因此黑格尔指出：“不用说，思维的形式诚不应不加考察便遽尔应用，但须知，考察思维形式已经是一种认识历程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认识的过程中将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对于思维形式的本质及其整个的发展加以考察。思维形式既是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是对象自身的活动。”²还是中国古人说得好：“操斧伐柯，其则不远。”³就是说，工匠操斧伐木以作斧柄，最好不过的是反身求则、就近取法。可见思维活动与思维方法不相睽离，思维方法就在思维活动之中。而康德对于作为方法论工具的“批判”的过度倾重就像要求学游泳者在下水游泳之前就必须掌握游泳方法，如果尚未掌握游泳方法就切勿下水游泳一样不合理。

康德的这一不合理之处又导致其“批判”概念陷入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康德运用“批判”这一思维方法来审核形而上学的思维活动时，用他的话来说，是在理性的法庭上运用理性来审核理性，尽管“批判”的思维方法是以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的名义来进行裁决，但它自身恰恰是没有经过审核的，因而它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黑格尔说：“因此可以说，这乃是思维形式考察思维形式自身，故必须由其自身去规定其自身的限度，并揭示其自身的缺陷。这种思想活动便叫做思想的‘矛盾发展’(Dialektik)”。⁴这种思想的“矛盾发展”的悖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康德“批判”概念的合法性。

黑格尔在其逻辑学研究中对于康德的批评旨在为确立自己的辩证逻辑开道。黑格尔认为，逻辑有两个主要部分，即思维活动与思维方法，这二者是一体化的，方法“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的本性，同时，正是内容这种自己的反思，才建立并产生内容的规定本身。”⁵然而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这种一体化的关系却消失了，思维方法只是被当作思维活动的手段，只是思维活动的外在形式，它被抽去了内容，不能深入到被思维的东西里去，也不能考虑思维对象的状态。这就使得康德的批判哲学所设定的思维对象就像存在于彼岸的“自在之物”，思维达不到它，它只是一种子虚乌有的空洞的抽象。真正有效的思维方法应当打破这种相互隔绝的状态而达成与思维活动的相互交融。黑格尔认为，哲学至今还没

¹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49 页。

²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18—119 页。

³语出《诗经·豳风·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中庸》引此文。朱熹《集注》：“柯，斧柄。则，法也……言人执柯伐木以为柯者，彼柯长短之法，在此柯耳。”陆机《文赋》：“至於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

⁴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19 页。

⁵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一版序言，第 4 页。

有找到自己的方法，还是借用别知识领域如数学的方法。哲学应该拥有自己的方法，对它来说有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必须符合思维活动本身：“对于那唯一能成为真正的哲学方法的阐述，则属于逻辑本身的研究；因为这个方法就是关于逻辑内容的内在自身运动的形式意识。”¹

黑格尔理解的“真正的哲学方法”就是“否定的辩证法”。他指出，为了争取科学的进展，唯一的事就是要确认以下的逻辑命题：

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或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或说，这样一个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自行消解的被规定的事情的否定，因而是规定了否定；于是，在结果中，本质上就包含着结果所从出的东西；——这原是一个同语反复，因为否则它就会是一个直接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结果。由于这个产生结果的东西，这个否定是一个规定了否定，它就有了一个内容。它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比先行的概念更高、更丰富；因为它由于成了先行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它包含着先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物的统一。²

黑格尔还以哲学史的嬗变为例，来说明“否定的辩证法”作为思维方法的普遍性和合理性。他反对在哲学史研究中使用“推翻”这一说法，因为每当这样使用时，往往意味着那被推翻的哲学已彻底摧毁、根本完结了。果真如此，那么哲学史的研究将成为一桩异常苦闷的工作，因为从中看到的，只是在时间进程里已有的哲学体系如何一个个被推翻的情形。“我们应当承认，一切哲学都曾被推翻了，但我们同时也须坚持，没有一个哲学是被推翻了的，甚或没有一个哲学是可以推翻的。……哲学史的结果，不可与人类理智活动的错误陈迹的展览相比拟，而只可与众神像的庙堂相比拟。这些神像就是理念在辩证发展中依次出现的各阶段。”³

可见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辩证法”是通过一系列的否定来把握研究对象的方法，但这种否定并不是全盘推翻、彻底抛弃，而是否定中有肯定，扬弃中有保存，同时在这种否定与肯定、扬弃与保存的相互对待、相互包容中使得逻辑的运动走向丰富、不断提升。

总之，黑格尔的“否定”概念和康德的“批判”概念都是在方法论意义上使用的，或者说都是一种考察和研究认识活动的方法。黑格尔除了引用和沿用康德的现成说法之外，自己很少使用“批判”概念，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批判”概念还不足以达到哲学话语的地位，取而代之的哲学话语是“否定”概念。不过黑格尔的“否定”话语与康德的“批判”话语有一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从具体现象

¹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导言，第36页。

²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导言，第36页。

³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1页。

中高度抽象出来的哲学话语，主要是学理性、中性的。从康德到黑格尔，逻辑显然是向前走的，如果说康德开创了“批判理性”的话，那么黑格尔则建立了一种“否定理性”。二者相比，黑格尔扬弃了康德的知性思维，将否定或曰批判提升到了辩证思维的高度。当然黑格尔将每一次“否定”都看成理念在辩证发展中依次出现的各个阶段，仍是在客观唯心主义的框范内所作的“头足颠倒”的界定，但黑格尔对于康德崇奉的“自在之物”的拒斥，则是将他在理念世界中颠倒了的东西又重新“唯物地颠倒过来”了，列宁对此倍加赞赏：“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按指黑格尔《逻辑学》)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反而是事实!”¹

三、马克思：“批判”作为变革社会的利器

马克思的“批判”话语可以说是对于康德的“批判”概念与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的综合，它是在对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进行科学改造的基础上，继承了前者的概念，借鉴了后者的逻辑，将二者加以重铸的结果。而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将“批判”概念运用于社会历史场域，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封建专制制度、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利器。需要指出的是，“批判”一词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是一个高频词，而且多部著作以“批判”为名，可见他对于这一“利器”的重视程度。

马克思在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于“批判”概念的界定就一扫德国古典哲学的经院气，表现出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凌厉锐气：“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²这里所说“批判”已不是那种单纯的、中性的学理研究，而是将矛头直指德国的宗教神学、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³而到了《资本论》，马克思也往往是在反对、驳斥、揭露的意义上使用“批判”概念，如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的批判、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等。可见马克思在反对、拒绝、排斥、消解等负面意涵而非中性意涵上使用“批判”概念乃是一以贯之。

马克思“批判”话语的凝练，是在语言学、词源学意义上进行开发和重建的结果。德语“批判”(Kritik)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评论，检讨，检阅；二是

¹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54，253页。

²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³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指批评，苛求，批判，非难。¹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对 Kritik 相对应的英语词 Criticism 进行了厘定，指出该词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希腊文 Krités，意指法官，即行使审核、评判、裁决之职者。它也被用作对文学的评论，尤其是 17 世纪末以来，被用作“评断”文学或文章。雷蒙·威廉斯指出，该词还有一个负面的意涵“挑剔”被普遍通用，经过持续沿用而终成为主流。²由此可见，马克思将“批判”概念用作反对、拒斥、弃绝、消解等意义，是对于 kritik 一词固有的负面意涵进行了开发、重建而使之得到了强化。

马克思“批判”话语有其深刻的哲学背景。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但声明自己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截然相反。他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被神秘化了，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颠倒的，现在必须把它重新颠倒过来，以便发现其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一是“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二是“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³在这里马克思针对黑格尔为封建德意志国家作辩护的保守倾向进行了批判，黑格尔曾说过一句话：“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⁴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这一命题与其辩证法的基本要义自相矛盾，⁵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每个事物都应从不断运动和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一切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因而凡是现实的东西最终都会成为不合理的，也就是说，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必然灭亡的！这就昭示了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意义。于此足可见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的神秘方面的批判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那就是对于封建制度、宗教神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些现存事物的拒斥和消解。

说起马克思的“批判”话语，不能不提到他一系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名的著述，⁶特别是最终定本《资本论》，也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其立论就是建立在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上的。马克思在阅读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著作时，发现其中存在着重要的缺失和疏

¹<http://dict.tu-chemnitz.de/dings.cgi?lang=en&service=deen&opterrors=0&optpro=0&query=kritik&iservice=&comment=&email=>

²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97 页。

³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 页。

⁴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序言，第 11 页。黑格尔后来在《小逻辑》中又引用了这一说法。——见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导言，第 43 页。

⁵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8，269 页。

⁶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等。

漏，那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中剩余价值的形成和增殖存而不论，这样它就忽略了资本产生的根源，模糊了资本积累的本质、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抹煞了资产者剥削工人的事实，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马克思指出，这些英国的经济学家从不研究剩余价值本身，他们只是将资产者与工人之间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将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他说：“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更值得质疑的是，李嘉图等人留下这种空缺其实是有意为之，恰恰暴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维护自身利益的狭隘一面：“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¹这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罔顾事实的态度只能使其理论与科学性、真理性背道而驰。对此恩格斯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斥责：“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²

通过上述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马克思发现并揭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剩余价值问题上采取沉默、造成脱漏的奥秘，在看似若不经意的疏漏中遮掩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根源，看似无意识但恰恰暴露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为此马克思断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的过渡阶段，而是看做永世长存的社会生产形式，那它就不能够成为科学。而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而这里所说的“批判”，就是无产阶级的批判。³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使得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⁴成为可能。可见，马克思所提倡的“批判”，不仅意味着扬弃现存的学说以谋求理论的变革，而且也意味着否定现存的社会现实以推动社会的变革。

¹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页。

²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³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版跋，第16，18页。

⁴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四、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大众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以“批判理论”（也称“社会批判理论”）为标志，它在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一文中得到系统的论述，并在该学派其他成员的著述中得到呼应，成为盛行一时的学术流行语。“批判理论”延续了马克思批判话语的社会历史取向，力图将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分析解剖做成类似当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所做的批判考察，从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开了风气。

作为倡导者，霍克海默声称“批判理论”有两个理论基础，一是笛卡儿的《方法谈》，一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者创立并广泛运用于特定学科研究的传统理论，依据产生于一定社会生活的诸种问题组织着人们的经验；而后者则为“批判理论”凝定了灵魂。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理论作为广泛运用的一般理论游离于人类活动和历史进程之外，而批判理论却始终谋求人类活动的合理组织，将其视为应予展开并使其拥有合法地位的任务。批判理论并不仅仅关注现存的生活方式已经制定的目标，而且还关注人类的所有潜能，它的目的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更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为此霍克海默对于“批判理论”充满了自信，宣称“目前最先进的思想是社会批判理论”。¹理由在于，目前每一种始终如一关心人的思想都凭借自己的内在逻辑汇聚到了“批判理论”之中，使得传统理论相形见绌。“批判理论”深切关心当下大多数人关心的事情，它所使用的概念都有明确的指向，那就是对于现存事物的批判：“批判理论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以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为前提，都以沿着由理论本身规定的路线与现存秩序作斗争为前提。”²马克思主义论述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及衰亡等问题是其重要内容，而个中意义不应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中寻找，而应在那种将其改造成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中寻找。它根本不相信现存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行为准则，而以合理的社会状态和生活条件为追求的目标，它不会为现存社会服务，而只会揭露现存社会给人造成苦难的秘密。因此霍克海默断言：那种“想在自身之内寻找宁静的哲学，无论它出于何种真理，都与批判理论无缘。”³

从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让人很自然想到康德的“批判哲学”，霍克海默的学术之路最早是从康德研究起步的，1922年他以论文《关于目的论判断力的悖论》获得博士学位，1925年他又以论文《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获得大学授课资格，康德研究的背景一直影响着霍克海默的学术研究，包括他的“批判理论”。

¹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页。

²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

³霍克海默：《跋》，《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

霍克海默也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方面，如辩证思维、逻辑方法等，给“批判理论”注入了动态观念、现实关照和逻辑运动的历史感。霍克海默坦承“批判理论”乃是这些“德国唯心主义”前辈的精神后裔，他说过，“批判理论”把在历史过程中的人作为研究对象，把物质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与德国唯心主义具有某种契合之处”。“批判理论就不仅仅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后代，而是哲学本身的传人，它不仅仅是人类当下事业中显示其价值的一种研究假说，而是创造一个满足人类需求和力量的世界之历史性努力的根本成分。”¹他还指出，“批判理论”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原理，“概念的发展如果不与历史发展相平行，那它至少也与历史发展有实实在在的关系。”²而在这一点上，霍克海默明确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举而奉为楷模。此事意味深长，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那些一脉相承的东西恰恰也为“批判理论”所延续，而“批判理论”也像《资本论》一样，将自己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建立在对于黑格尔等“德国唯心主义”前辈的批判之上，这一点在霍克海默的著述中随处可见。

在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前辈的批判继承和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推崇扬厉的基础上，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大众文化批判。作为前奏，霍克海默曾在《哲学的社会功能》(1939)一文中讨论过流行文化问题，该文首先从哲学的层面对于“批判理论”进行认定，认为“批判理论”体现了哲学与现实相对抗的根本原则，它对于流行文化的批判正显示了哲学的功能之所在。他这样说：“哲学的社会功能……只有从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发展中才能被找到”，“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³他认为，在当下生活中，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仿效。而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灌输给它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然而在流行文化中看到的恰恰是另一番景象，在市场机制的操纵之下，无论是在银幕上还是广播中，流行文化按照流行的思维方式和原则规范来进行创作完全被合理化了，它的生产、制作、传播、消费完全是策划和运作的结果，这一运行程序最初的目标就不是传达某种旨趣，而是迎合流行的公众观点和庸俗趣味，而在背后，则是那些制作人、策划人、经纪人、广告商们处心积虑的算计和预谋。这些算计和预谋的成功之道莫过于迎合公众的趣味，而它最大的失败也莫过于对公众反应的误判。需要说明的是，霍克海默排斥的“公众”是指那种在资本主义极权体制的压制之下个性丧失殆尽，道德水准低迷，神经变得麻木，身体已被驯化的庸众，正是他们构成了流行文化的社会基础。对于“公众”或“大众”的研究在德国有较长传统，以往德国哲学家对之一般持

¹霍克海默：《跋》，《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232页。

²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页。

³霍克海默：《哲学的社会功能》，《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250页。

否定和排斥的态度，霍克海默延续了这一传统并赋予新的内涵，而这恰恰对其大众文化批判起到了推助作用。

霍克海默转向大众文化研究是 1940 年代初的事，这时他因病迁居加里福尼亚，更多接触到好莱坞电影以及其他大众文化。在《艺术和大众文化》(1941)一文中，霍克海默将流行文化也称为“大众文化”，在他看来，当今大众文化显示的是一种社会机制，而不是人的本质，这种制度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同一个模式，无论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它都只允许人们作出单一的反应，因此大众文化所表达的判断往往并不来自大众自身，而是来自掌握社会权力的强势群体的指使。有鉴于此，霍克海默对于大众文化持有的否定态度颇为决绝：“今天，叫做流行娱乐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文化工业所刺激和操纵以及悄悄腐蚀着的需要。”¹霍克海默的这些表述是有其特定语境的，当他遭到德国纳粹的迫害踏上流亡之路辗转来到美国时，发现与美国的大众文化格格不入，商业化机制和市场权力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所表现出的专制和暴力，在他看来与法西斯主义的行径并无二致，从而对此深感痛心疾首！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显示了反思历史、审视当下的凌厉锋芒。霍克海默引用杜威关于艺术是“交往的最普遍和最自由的形式”的观点，认为当今大众文化的情况恰恰与之相悖，人际之间毫无普遍自由的交往可言，而只有欺骗和强制：“在一个公认的语言仅仅加剧着混乱的世界中，在一个独裁者说的弥天大谎越多，他们越能深刻地打动大众的内心的世界中，艺术与交往之间的鸿沟必然是较大的。……在这点上，收音机和电影决不亚于飞机和枪炮的作用。”²不难见出，在这些饱含着激情批判和深沉反思的字里行间翻卷着法兰克福学派一代学人历尽苦难的岁月风云，涌动着他们对于给人类制造苦难的邪恶势力的无限激愤！

已如上述，霍克海默在《艺术和大众文化》一文中，已经使用“文化工业”概念了，同时也称之为“消遣工业”、“娱乐工业”等。³不过对于“文化工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则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7)一书。该书虽说合著，但其中不同篇目的撰写却是各有分工的，收入此书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由阿多诺执笔，该文对于“文化工业”的讨论虽然代表霍克海默的意见，但分明带有阿多诺的个人风格。这里要插一句，霍克海默因病迁居加里福尼亚时，只有阿多诺始终陪伴左右，他们的个人友谊促成了学术上的合作，同时又以各自的学术个性影响着对方。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如此标题就足以表明该文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立场了，正是这篇文章，将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向前推进，开辟了

¹霍克海默：《艺术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73—274 页。

²霍克海默：《艺术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4 页。

³霍克海默：《艺术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73，275 页。

文化工业批判的问题域。阿多诺后来晚年在《文化工业再思考》(1963)一文中回顾此事时指出,所谓“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原本是一回事,然而使用“大众文化”概念容易与那种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的流行艺术混为一谈。为了避免引起误解起见,他认为采用“文化工业”更加合适。¹其实这并非只是简单的概念、用语之争,而是旨在充分彰显“文化工业”与以往从百姓大众中自发形成并广泛流传的“大众文化”截然不同的品质,它在经济、技术、行政的力量操纵之下已弥平了独特性和自主性,趋于标准化、格式化、通用化了。用阿多诺的话来说:“这成其为可能,既是由于当代技术的发展水平,也是由于经济的和行政的集中化。”文化工业藉此自上而下地整合了它的消费者,在这里“大众绝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顾客不是上帝,不是文化产品的主体,而是客体。文化工业使我们相信事情就是如此。”²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对于“文化工业”进行了更为系统也更为细化的分析。首先,文化工业是现代商品社会的产物,诸如电影、广播、爵士乐和杂志等大众文化都已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成为一种商品类型,受到资本运行普遍法则的支配。其次,这种商品化的文化工业并非与美学一刀两断,它倒是往往能够接纳美学,只不过将美学用于为市场服务罢了。它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将康德经典性的美学原则“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置换为“有目的的无目的性”的美学信条,就是说原先“无目的”的文化艺术如今已经成为“有目的”的,而这个“有目的”就只是指市场的目的了:“为了满足娱乐和轻松的需要,目的也就接纳了无目的性。只要金钱是绝对的,那么艺术就应该是可以任意处置的,这样,文化商品的内在结构便发生了转换,并呈现出来。在竞争社会里,人们把艺术作品当成了有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有用是无所不包的,而无用却被抛在了一边。”³广告就是典型一例,任何广告都不乏美学意味,有的还具有很高的美学水准,但其美学意味并非仅仅用于欣赏和娱情,欣赏和娱情只是手段和途径,终究还是为了达到市场的目的。总之,文化工业演示了当今美学的悲剧性:“无目的”的美学被“有目的”的市场所利用,最终也被“有目的”的市场所消解。再次,文化工业在科技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操纵和控制下日益丧失个性化、唯一性而趋于标准化、同一性。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被标准化,商品类型被同一化,而且个人也只有与群体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能缓解压力、避免冲突。这就导致了畸形心理的孳生,造成那种以流行趣味为创新的虚假个性,结果越是标新立异便越是丧失个性,“个性化”的每一

¹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高丙中译,《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²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高丙中译,《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199页。

³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次进步，都必须以牺牲个性为代价。因此“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¹最后，文化工业在整个社会成员中所造成的标准化、同一化及其对于每一社会个体个性的泯灭，恰恰预示着政治领域将要发生的事件。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这样一条逻辑链条是成立的：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同一化通往资本主义垄断的极权体制，而资本主义垄断的极权体制最终通往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而这一切恰恰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也是正在眼前上演的：

流行歌曲的传播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美国人用“风靡一时”来表示像流行病一样出现的时尚——高度集中的经济实力加剧了这种狂潮，这说明，那些把广告业务统揽在自己手中的老板们，早就在文化领域里渲染这种现象了。总有一天，当德国法西斯决定用高音喇叭开始说“无法忍受”的时候，第二天，整个国家也都会异口同声地跟着说“无法忍受”。同样，在“闪电战”中，受到德国重炮袭击的国家，也把这种说法写在了自己的标语中。统治者采取的措施就是，不断重复这些名词，让人们尽快熟悉它们，就像在自由市场里，如果每个人嘴边都经常挂着产品的品牌，产品就会销量大增一样。为词语注入特定的指涉，将它们盲目而又迅速地传播开来，这种做法完全可以把广告同极权口号联系起来。²

正是依据这一逻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乃是政治专制主义的温床，文化工业与法西斯文化有着毋庸置疑的一致性，甚至文化工业就是一种潜在的法西斯主义，一种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马尔库塞的大众文化批判延续了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并有了新的发展，有论者对于马尔库塞的贡献加以称道：“在后来的岁月中，马尔库塞成为批判理论的主要设计师之一。”³霍克海默早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中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在目前这样的历史时期中，真正的理论更多地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⁴，这正是马尔库塞 20 多年后在《单面人》(1964)一书中深入讨论的话题。

马尔库塞在该书的“导言”中开篇就指出，批判理论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它必须从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利用中抽象出来。而在发达工业社会，最突出的“历史的客观性”何在呢？那就是技术理性取代了政治理性，成为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调节的新的权力形式，它调和了与之相对立的力量，消弥了旨在挣脱劳役和控制、争取自由解放愿景的抗议之声。技术的进步使得公共交

¹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2 页。

²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4—185 页。

³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 页。

⁴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9 页。

通和大众传媒、吃穿住行和日用商品、休闲娱乐和信息交流等大大丰富和便利，成为更多社会阶层和每个个体都能享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强制灌输就不再是宣传鼓动，虚假意识就变成诱人的生活方式，它导致了安于现状和抵制变化的普遍心态。于是“一种单面思想与单面行为模式就这样诞生了。”¹

在马尔库塞看来，单面性是一种人格，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该书取名为《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在书中触目皆是的是一个与单面性相关的巨大大概念群，包括单面社会、单面现实、单面文化、单面生活、单面思想、单面政治、单面精神、单面行为、单面域、单面哲学、单面科学、单面结构、单面语言、单面风格等等。所谓单面性，就是对于当下现实一味肯定、全部接纳的单面性质，与之相连的是认同、妥协和调和，它最终推助了极权、专制和独裁。与单面性相对立的是双面性，那就是在人们对于当下现实普遍加以肯定的情况下，它却保持批判、否定和超越的立场。马尔库塞说得直截了当：“双面论域乃是批判的思想方式”，而从一般哲学研究转向发达工业社会研究，从本体论辩证法转向历史辩证法时，恰恰“保留了作为批判、否定思维的哲学思想的双面性”。²不过双面文化也并不是一味批判，在整个文明时期自有其肯定的方面，如埃及艺术、希腊艺术及哥特艺术都是显例；巴赫与莫扎特也显示了艺术的肯定方面，它们全面融入了它们所置身的社会；沙龙、钢琴演奏会、歌剧、剧院，也都有创造和呼唤现实的一面，虽然它们给人以不同于日常经验的节庆般的经验。

这样，就有了两种文化，一是双面文化，这是一种前工业社会的文化、一种前技术文化，马尔库塞称之为“高等文化”，像17世纪荷兰绘画、歌德的《威廉·麦斯特》、19世纪英国小说、托马斯·曼的作品等，它们对实际生活保持了否定和超越的姿态。在马尔库塞看来，高等文化往往是与实际生活相疏离并从而保持其超越性的，唯其如此，才能对于实际生活的负面担当起批判的职责。一是单面文化，即在发达工业社会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大众文化，这是一种对于实际生活环境表示认同、妥协和调和的文化。

但是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消解了高等文化的对立和超越的因素，这并不是说高等文化向大众文化倒退，而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实改造了高等文化。当代人比古代文化中的英雄和神祇还要强大，解决了许多以往的英雄和神祇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他同时也泯灭了寄寓在高等文化中的希望和真理。因此当今时代新的特征就表现为通过消解高等文化的批判、否定和超越的力量而使之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对抗归于缓解，从而使高等文化也变成了大众文化。马尔库塞写道：

如果面向大众的信息传播完全和谐且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与商品融合在一起，它们便使这些文化领域恢复了对它们自己的共

¹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²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121页。

同特性——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现状的理性集中在它上面，而全部异己的理性都被融合到了它里面。¹

理想与现实这种相互同化的趋势，说明了理想已被消解，它已被从灵魂、精神和心灵的高贵王国中剔除出来，置换成一个操作问题、一种操作程序。这一逆转证明了一个事实，发达工业社会面临着理想物质化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高等文化变成了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一转变中丧失了大部分真理。

值此艰难时世，马尔库塞提出了他的济世之道，那就是回归双面文化。马尔库塞以批判理论的基本范畴为例说明之。他指出，批判理论使用的“社会”、“个人”、“阶级”、“私人”、“家庭”等基本范畴原本是关涉否定和对立的概念，但因其发达工业社会的背景下提出并被这一社会现实所整合，所以逐渐失去了批判含义，变成了描述性、欺骗性和操作性的用语。在他看来，重建之道在于“重新把握这些范畴的批判意义”，²而且必须理解其批判意义如何为社会现实所消解的原因，从与历史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向抽象思辨回归，从社会经济的批判向哲学回归，在肯定与否定、生产性与破坏性对立统一的双面论域中恢复这些基本范畴的批判意义。总之，马尔库塞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开出的救世药方就是所谓“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亦即对于现存事物的批判。

从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可以发现他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一脉相承之处：一是他对于单面文化/双面文化或大众文化/高等文化的褒贬扬抑，往往泾渭分明，作一刀两断语。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来说具有普遍性，这与他们曾长期接受欧洲古典主义美学趣味的熏陶和在流亡生涯中对于高度商品化的美国流行文化的厌恶有关。二是此前饱受德国纳粹的迫害和摧残的遭遇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中人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因此在其著述的字里行间往往可以读出这种泣血之痕，在《单面人》一书的结尾，马尔库塞再次以批判理论对于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表示一种大拒绝，并引用本雅明在法西斯年代之初所说的话作结：“只是为着那些没有希望的人，我们才被赐予希望”！³

五、中国：大众文化批判的话语重建

当今中国学界使用的“大众文化批判”话语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最早的接触缘自1980年代末国内译出版的几套丛书，即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重庆出版社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以及其他零星出版的著作和文选，囊括了法

¹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²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³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从而使得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及“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概念。这些著作的出版，当时还是延续“方法热”的余绪，偏重对于西方学术新潮的引进。然而时隔不久，恰逢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理论和概念在中国有了用武之地。

中国学界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从一开始就遇到两个方面的尴尬，一是对于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化的转型缺乏心理准备，二是在应对新型的当代大众文化时缺乏理论工具。这种尴尬导致对于大众文化产生很多误读和误判，造成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照搬和套用。现在能够检索到的最早篇目正如其题所示为“法兰克福学派与大众文化批判”的介绍性文字，该文逐一引用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批判理论，对于当时在中国刚刚兴起的大众文化的即时性、实用性、零散性、模式化等特征进行了批评。¹而期间发表的一批前卫性的相关文章大多不脱这一套路。²但是正像任何偏颇一样，走到极致总会触底反弹，于是后来对此进行反思和纠偏的呼声渐起。陶东风对于1990年代国内大众文化批判不顾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语境，机械套用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与批判话语提出异议，并对自己曾热衷于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批判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作出“自我检讨”和“自我反省”，并喊出了“慎用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的口号。³无独有偶，黄力之也对自己的学术取向进行了清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曾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而自己在1990年代的文章和著作中亦持如此立场，但在后来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感到“大众文化批判则是一个有问题的理论体系”，这表现在它的内在矛盾性上。文章列论了大众文化批判的三大内在矛盾以证之。⁴期间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态度发生类似戏剧性翻转的不乏其人，只不过并非都是公开发表声明，而是采取比较低调的方式，或在学术研究的实际操作中就已转向，或干脆就从这一是非之地抽身而退。不过还有的研究者从一开始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就作两面观了。

数据统计更能说明一般情况，据中国知网显示，以“大众文化批判”⁵为篇

¹刘春：《法兰克福学派与大众文化批判》，《现代传播》1992年第3期。

²如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金元浦：《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张汝伦《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潘知常《文化工业：美学面临新的挑战——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之一》（《文艺评论》，1994年第4期）、尹鸿《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等文。

³陶东风：《文化批判的批判》，《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⁴黄力之：《大众文化批判的三大内在矛盾》，《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

⁵在国内学界的研究中，与“大众文化批判”意思大致相近的概念还有“文化工业批判”、“当代审美文化批判”或“文化批判”，此处不暇逐个统计，而仅以大众文化批判为例。

名的论文从 1992 年起始至 2014 年底共 99 篇，其中对本题无效¹的 16 篇，可以剔除。在下余 83 篇中，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加以肯定和认同的 41 篇，提出异议和质疑的 42 篇，后者已赶上前者。后者提出异议和质疑主要是：其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贵族主义色彩。有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旧的文化贵族立场，以文化精英自居，强调人与社会，人性与科技，文化艺术与时代的对立，以先验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来衡量文化艺术和文化生产，因而使理论严重落后于实际。”大众文化在冲击精英文化的同时，也给精英文化展现出一片新的空间。精英文化逐渐走出了世代栖息的艺术殿堂，从精英舞台走向了大众传媒，在大众社会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渗已是不争的事实。²其二，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的锋芒太过集中于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和市场性，而忽视了它的各种正能量。有学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来临，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调控着文化，这无疑使文化突破了狭隘性、封闭性、贵族性等局限，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平民色彩和娱乐功能，“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没有充分意识到市场经济社会毕竟为大众文化克服以往文化的局限提供了物质前提和制度保障，从而以孤立、静止而不是全面、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大众文化，没有意识到大众文化与现代政治、经济的结合是有机结合而不是机械结合”。³其三，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对立面对当代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以保守主义的态度来抗拒资本主义的文化范式。有学者认为：“受卢梭思想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文明的发展、社会技术的进步持一种抵触情绪，他们对幻想中的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持一种赞美激赏态度，并以之否定现存社会。”在每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总会有新的、与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产生，而法兰克福学派将旧时代的艺术范式视为新时代艺术的目标，表现出浓厚的保守主义艺术原则。⁴其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偏颇还与其对于大众的偏见有关，他们无视和低估了大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主动性。有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基本上将大众等同于被动的客体和接受者，没有看到或低估了大众本身的批判性和主体性。实际上，大众本身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也是不能否定的。”⁵

总之，无论是个案分析还是大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都足以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不无可借鉴之处，但其本身却是存在弊端的，而其立足点也

¹按“对本题无效”的篇目是指与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个人无涉的篇目。

²罗小青：《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大众文化批判——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湖北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1 期。

³王光文：《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齐鲁艺苑》2004 年第 2 期。

⁴张羽佳、曲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得与失》，《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⁵马驰：《论大众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及其历史局限》，《学习与探索》2004 年第 3 期。

存在着错位。它是从特定的遭遇和语境出发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流行文化的一种否定性立场和态度的理论表达，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对于给他们造成极大肉体摧残和精神创伤的法西斯主义的抨击移植到了发达工业社会及其文化身上，正如论者所说：“纳粹的经验深深刺伤了研究所(按指霍克海默领导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员。使他们仅仅根据法西斯的潜能来判断美国社会。”¹没有谁可以否认晚期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有垄断和极权倾向，也没有谁可以否认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着资本主义极权体制的背景，但是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大众文化统统当作法西斯主义文化来批判，那就阐释过度、有失分寸了，如果再将这一理论照搬到正在经历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用以衡量中国当代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那就更是圆凿方枘、龃龉难合了。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背景下兴起的，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这一巨变按下了启动钮，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中国的经济生活经历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加入WTO、金融风暴的来袭等重大事件，使得整个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期显得波谲云诡、跌宕起伏。而上述中国学界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前恭后倨、先扬后抑的戏剧性翻转恰恰在此际几乎同步发生，成为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缩影。而这一切，正赋予了当今中国的“批判”话语以新的内涵。

“批判”话语从康德的哲学界定开始，继而黑格尔将其提升到辩证思维的高度，随之马克思对其进行科学的改造并将其引向社会历史场域，接着法兰克福学派传承发扬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在特定语境下引向对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抨击一途，无一例外都是德国人的思想操练场。只是在转型期大众文化兴起的条件下中国学界引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才将“批判”话语在论争和逆转中演绎成了炙手可热的热门话题。

按说“批判”概念原本不属中国的知识谱系和话语谱系，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中并无“批判”的概念。据考证，该词在汉语中出现是在19世纪晚期，是从日语中借来。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受到西方式的教育，接受了当时的先进思想，自发组织编译日本书籍。经他们之手，将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介绍到中国来，与此同时，也就将大批现代日语词借用过来，其中就有“批判”一词。²“批判”一词在中国的最早使用与哲学、美学不无关系，梁启超1903年

¹见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

²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

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中将康德“三大批判”译为《纯理性批判》、《实理性批判》、《判定批判》。他虽对“批判”概念未作详解，但将康德称为“检点学派”，认为康德在调和理性派(论定派)与经验派(怀疑派)两派之争时，主张“必当先审求智慧之为物其体何若，其用何若，然后得凭借以定其所能及之界，于是有所谓检点派之哲学出焉。”¹王国维在1904年到1906年间系统介绍了汗德(康德)其人其书²，也将康德的三书译为“批判”，不过此时该词的使用并不稳定，有时译作“批判”，有时译作“批评”。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对于康德的“批评哲学”之特色作了如下解释：“必先检此等原则发现之形式，及其于经验上所有之普遍性及必然性，此汗德哲学之特色也。汗德于是就理性之作用，为系统的研究，以立其原则，而检其效力。”³可见中国人最早使用“批判”概念与康德有关，而且是在“学理的探究”的本义上使用的。可以认为，梁启超、王国维此举最早开启了“批判”话语中国化的进程。

从1930年代至今康德的“三大批判”有多种中译本，而较早时期对于康德的“批判”概念解得最切的当数宗白华，他认为：“康德所谓批判(Kritik)，就是分析、检查、考察。批判的对象在康德首先就是人对于对象所下的判断。分析、检查、考察这些判断的意义、内容、效力范围，就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任务”。⁴后来影响最大的则是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的解释：“探讨、考虑、分析、审察人的认识能力，指出它有一个不能超越的范围或界限。这就是康德使用‘批判’一词和把他的哲学叫做‘批判哲学’的原故。”⁵由于当时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的特定氛围，该书躬逢其盛而声誉鹊起，推助了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概念的流行。而“批判”概念向其学理探究之本义的回归，让人们发现了这一曾长期被政治化、否定性使用的概念竟还有截然不同的意涵，一种迥异于“政治批判”、“大批判”的学理性、价值零度的意涵，并日益广泛地接受了这一意涵，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大大增进了“批判”概念在实际使用中的弹性和宽容度。正因为如此，所以当199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概念横空出世之时，这一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当突兀和陌生的概念，在具体运用中尽管也不乏偏激的情况，但重蹈政治化老路的做法却始终不被普遍认同，这也使得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在实践中很快被学界质疑和弃置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儿。

如今，“批判”话语中国化的进程还在继续。风云际会，这一进程又遇上了

¹《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6页。

²见王国维：《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事实及其著书》、《汗德之哲学说》、《汗德之知识论》、《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等篇，刊于《教育世界》1904年5月74号、1906年3月120号、1906年5月123号。

³王国维：《汗德之哲学说》，刊于1904年5月《教育世界》74号。

⁴宗白华：《康德美学原理评述》，《新建设》1960年第5期。

⁵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

两大动力的推助：一是社会环境的变迁，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大众文化密切关连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研究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趋于优化，在更高的水平上吸纳和整合各种新兴学科和新潮文类，这种学科交叉、知识综合的广阔地带正是酝酿生长性、未来性的适宜土壤。这一切恰恰对于“批判”话语构成了一种普遍的价值期待：它理应做到立场更加公允，评价更加稳健，心态更加平和，理论更加成熟，而这正是今天“批判”话语更具建设性、构成性的充足理由律。